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(第十五辑)

总主编/李玉明

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

董钊云 / 著

山西平遥日升昌票

号是中国第一家票号，本书介绍了日升昌票号从其形成直至衰亡的全部过程，展示了日升昌掌柜们的历史功绩，也展示着他们在经营过程中的艰难和坎坷，山西票号在一定历史时期，可以说是“执全国金融之牛耳”。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

25
2

责任编辑:刘冬梅

复 审:余超英

终 审:董高怀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15辑)

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

董剑云 著

*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-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.75 字数:300千字

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(套)

*

ISBN 7-900362-60-6

G·24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员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玉山	马志超	于贵卿	于崇良	王克林
王志超	王宝库	王灵善	王振芳	王家壁
牛崇辉	田中仁	冯素梅	任茂棠	刘 巩
刘在文	刘伟毅	刘振华	刘晓丽	成葆德
齐荣晋	李元庆	李东福	李锐锋	吴广隆
宋丽莉	杨二怀	杨子荣	李建峰	张国祥
张捷夫	张鸿仁	罗广德	陈长禄	胡存悌
赵曙光	郑建国	降大任	郭维明	高 可
高专诚	陶正刚	柴泽俊	秦海轩	梁俊明
谢 恺	董永刚	董占锁	董瑞山	楚 刃
雷忠勤	霍润德			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、西裕成颜料庄和掌柜雷履泰	(2)
二、中国第一个票号	
——日升昌的诞生	(5)
三、雷、毛、盾和山西票号的发展	(9)
四、程清泮力挽危局	(16)
五、张兴邦将日升昌推向顶峰	(19)
六、分号掌柜邱泰基的四品衔	
——日升昌东掌的捐官与结交官府	(26)
七、日升昌的倒闭	(30)

主 编
副 编

任 茂 棠
王 振 芳

目 录

八、“富不过三代” ——日升昌财东李氏家族的兴衰	(37)
结 语	(41)
附：43家山西票号简介	(42)
票号四	
(e)	
(10)	
票号四	
(e1)	
票号四	
(35)	
(08)	

主 编 王 翥
主 编 王 翥
主 编 王 翥

引 子

票号从19世纪20年代起,在中国金融史上活跃了近一个世纪。因为票号的主要业务是异地汇兑和存、贷款,其职能已与现代银行相差无几,对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票号最早产生于山西平遥,后来就遍布全国各地。山西票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,可以说是“执全国金融之牛耳”。

说到票号的历史,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第一家票号,即平遥的日升昌票号。日升昌票号是道光初年从西裕成颜料庄演变而来的。而其创始人就是西裕成的掌柜雷履泰。

山西平遥因为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而名声鹊起,这与平遥票号昔日的辉煌不无关系,而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应该居其首功。如今的日升昌旧址,已成为中国票号博物馆。昔日的房屋结构还基本保持着原貌。五级青石台阶,三进的院落,“汇通天下”的镏金匾额,富丽堂皇的画栋雕梁……,所有这一切,仿佛向我们展示着日升昌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作用,展示着创办人雷履泰以及毛鸿翔、程清泮、张兴邦等这些日升昌掌柜们的历史功绩,也在展示着他们在经营过程中的艰难和坎坷。

一、西裕成颜料庄和掌柜雷履泰

从明代开始,平遥的颜料业就很发达,而且将生意做到了北京、天津等地。清朝嘉庆年间,平遥城内就出现了一家著名的颜料庄,这就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前身,总号设在县城西大街的西裕成颜料庄。

西裕成颜料庄是平遥县达蒲村李家出资开设的。达蒲村在平遥城西5公里处,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大村子。从雍正年间起,这个村子就有人开设颜料作坊,生产和经营颜料。这种作坊主要生产一种印染布匹绸缎的颜料——铜碌。其方法是在铜片覆盖醋糟,经过加热使之酸化,便形成铜碌,然后将铜碌剥下,再加工精制。李家见到颜料的经济效益很好,也投资开设了一个颜料作坊,地点在达蒲村的西头,便取名“西裕成”。刚开始生产时,颜料只是从达蒲村往外销,后来为扩大经营范围,便在平遥县西大街设立了门市部。

李家到李文赟这一辈时,由李文赟主持经营业务。这时的西裕成颜料庄已发展成为平遥的一个大商号,并且在北京、天津、汉口、成都等地设立了分号。到李文赟70岁高龄时,他便将西裕成交给了儿子李大全来主持。这时,因为颜料庄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,随时需要增添经营管理人员,于是便有了日升昌票号创始人雷履泰进入西裕成。

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(1770),平遥县龙跃村(原细窑村)人。祖籍平遥城内。清康熙后期,其曾祖辈雷中、雷禄

兄弟与城中一富户发生纠纷,吃了官司。县太爷贪赃枉法,断案不公,不仅判雷家败诉,当堂责打了兄弟俩,而且将他们从城里撵至乡下。兄弟二人落户到细窑村后,由于秉性与志趣不同,选择了不同的行当。哥哥雷中憨厚朴实,以务农为本;弟弟雷禄为人精明,以经商为业。兄弟俩含垢忍辱,憋着一股劲要活出个样子来。相传,雷中到中年时,已有骡马70余匹;雷禄的买卖也越做越大,每当生意旺季时,雷禄总要请哥哥安排人马帮助自己驮运货物。就这样,勤劳肯干加上省吃俭用,不到十年时间,雷家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。

雷禄生有七子,老七雷金库就是雷履泰的祖父,所以雷履泰也算是出身经商之家。只是当他出生时,家道已经衰落,后来父亲又英年早逝,家境更加拮据,雷履泰只得中途辍学,进城学做买卖。他曾先后在好几家店铺呆过,但都没有太大起色,后来便来到城内北门头拐角的一家宝局当了伙计。所谓宝局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以押宝方式进行赌博的赌场。开赌时,先将骰子丢在一个叫“宝盒”的木匣里,众人便开始下注,然后,便由看宝盘的人负责开盘,清算赌账。经过几年苦熬,雷履泰也熬成了这样一个看宝盘的把式。

雷履泰本来就是一个天资聪颖、头脑敏捷的人,在赌场里的几年看盘生涯,没能圆了雷履泰的发财梦想,但却使他磨励成敢冒险、不怕输的性格。他的这种情况,早就被西裕成的少东家李大全发现,并且了解得很清楚。几年之后,正当雷履泰在一家商号当掌柜,一筹莫展之际,李大全便把他请到西裕成来。

来到西裕成，雷履泰先在总号当了一段时间跑街（当时商铺为了解市场行情，掌握市场动态，往往雇一至二名伙计，调查同行的货物进出、仓库存储、销售情况等商业信息，称为跑街），熟悉业务后，就被派到西裕成汉口分号担任了掌柜。在汉口，他和分号协理程大培同心协力，默契配合，将汉口分号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四年后，雷履泰被派往西裕成北京分号担任掌柜。

北京分号是西裕成最重要的分支机构，经营规模大，站点分布广，无论是和客户结算货款，还是往总号解运利润，都会遇到大量现银的运输问题。长期以来，这一工作主要委托镖局负责。但在雷履泰进入西裕成时，国内社会局势和经济形势都已发生重大变化，镖局托运的安全性与时效性都面临着重大考验。一方面，由于灾荒频发，粮食歉收，以及官府勒索加重，导致白莲教、天理教起义此起彼伏，使得镖局运现的风险大大增加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国内及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，商埠之间的货币流通加快，数量增多，旧的运现办法费时费力，已成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。改运现为汇兑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。

于是，雷履泰借鉴当时北京一些商号兼营工商会（汇）票的作法，尝试着在京、晋两地之间用汇兑的办法进行资金调拨，结果非常顺利。当时，山西商人在北京做干果生意的很多，年终时常有大宗款项要运回老家，委托镖局押运风险大，运费高，因此，常常有熟人亲友找到雷履泰，将现银交到北京分号，然后回平遥总号提取现银。后来，要求汇兑的越来越多，雷履泰便安排专人，设立专账，开始兼营汇兑。起

先，双方协商由西裕成收取一点汇费，这种汇费称为“内贴”。西裕成有时手头资金紧张，便在外主动招揽汇兑者，这样就需要向汇兑者支付一定的贴利，称为“外贴”。这种资金拨兑方式，既方便了众多商家，也为西裕成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。

又过了几年，老东家李文赟去世了。少东家李大全完全执掌号务后，就将雷履泰调回总号，担任了大掌柜。时在嘉庆末年。

二、中国第一个票号——日升昌的诞生

雷履泰在执掌北京分号时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处理主营业务与兼营业务之间的关系问题。颜料是一种工业产品，在生产与销售环节沉淀了大量资金。而汇兑则是一种金融业务，为保证客户能随时兑取到现金，要求商号内必须有充足的流动资金。在实际操作中，汇兑尽管周期短、利润高，是一项很有前途的业务，但由于在西裕成的业务领域中处于兼营地位，在财力、物力和人力的分配上就必须为颜料主业让步，这就严重影响到汇兑业务的进一步开展。

从北京分号调回总号后，雷履泰全盘分析了西裕成的未来发展情况，萌生了放弃颜料主业，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想法。财东李大全对颜料与汇兑难以共存的状态也深有感触。所以，对他的这一大胆设想给予了大力支持，不仅

同意出资 30 万两白银，用于将颜料庄改组为票号，而且还首先用 3000 两白银买下了西裕成对面的木器铺，将其翻修成三进四合院，作为票号的办公地点。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由颜料庄改组而成的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正式成立了，取名“日升昌”，寓意繁荣昌盛，如旭日东升。

至此，西裕成告别了它经营有年、并已卓有成效的颜料主业，转而开辟了一个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全新行业——票号。票号的出现，不仅书写下晋商发展史上新的辉煌，而且也揭开了中国近代金融事业的崭新一页。

关于日升昌票号创立的具体时间，有的说是乾、嘉时期，有的说是道光初年。从一些有关史料中分析，应该是道光初年创立的。据碑刻记载，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，北京崇文门外的平遥颜料会馆重新修缮时，西裕成是捐款最多的商号之一，说明西裕成颜料庄当时还在。时隔十九年之后，即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，《颜料行会会馆碑记》上已无“西裕成”的名字，说明此时西裕成已不复存在。此外，据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《江苏巡抚陶澍奏折》称：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等地商人到苏州置办货物，价值达数百万两，“俱系会（汇）票往来”。说明此时票号已经产生，并有一定规模。综合这几条文献资料，日升昌成立的时间不会早于嘉庆二十四（1819），也不会晚于道光八年（1828）。平遥已故文史馆馆员石生泉早年致力于搜集整理票号史料工作，据他回忆：“日升昌的万金账，我（曾在旧书摊上）亲眼见过，上面写着某某银股多少，某某俸股多少。在前面的序文里，写着：头一帐以 6 年为一期，以后改为 4 年为一期，万金帐是道光九年立的，

这说明日升昌创办票号开头也没有一个规矩，慢慢才立起来的。”道光九年往前推六年，应是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符合根据碑刻和清档推导出的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至道光八年（1828）的时间范围。再从雷履泰的年龄来看，道光三年他53岁，也正是阅历丰富、年富力强的中年，他在此时创立票号，也是完全可能的。所以，以道光三年（1823）作为票号创立时间，是符合实际的。

日升昌票号成立之后，首先是扩展内部，即招贤纳士，广集人才，建立各种规章制度，加紧开展业务。

票号的业务，首先是汇兑业务，即此处交款，彼处取款，票号从中取得“汇水”（即汇费），而汇兑业务中又分商汇和官汇。所谓商汇，即商人通过票号将商款从甲地汇往乙地。为了扩展日升昌的此项业务，精明的雷履泰将晋中一带商人在全国各地经营茶叶、药材、干果、绸缎的具体地点，作了详细调查，再派得力人员前往这些地方创办日升昌分号。不久，日升昌在张家口、苏州、广州、常德、扬州等地共创设分号13家。这样一来，使得日升昌的业务蒸蒸日上，同时，也便利了各地商人的金融往来。所谓官汇，即经营官款的汇兑。清代朝廷规定，各地税收必须有一部分上缴户部，富裕省份还有支援贫困省份的任务。各行省和海关上解清政府的款项称为“京饷”，指拨有关驻军和贫困省份的款项称为“协饷”。不论京饷还是协饷，过去都是采取现银装鞘（银鞘为木制，中间有铁箍，两端呈尖形，每鞘装银1000两）的办法，派人通过各地驿站直接运往目的地。同治初年，日升昌首开京饷汇兑之先河，以后又广泛开展了各省各关汇兑京

饷、协饷、洋务经费、四国借款、庚子赔款等活动，从而扩大了业务范围。

汇兑的方式主要是票汇。汇兑就是采用汇票进行汇兑，“票号”就是因此而得名的。汇款人向某票号交款取得汇票，然后凭汇票到目的地该票号分号取款。因为汇票是汇兑的凭据，所以日升昌在汇票的防伪工作上就制定了非常有效的办法，除了规定专人书写及加盖分号印鉴外，还创造了以汉字代替数字的密码防伪办法，就是将汇票上所涉及到的银两数目、签发日期等数字都采用汉字代码书写。现举其中一套为例：全年十二个月的代码为“谨防假票冒取，勿忘细视书章”；每月三十天的代码为“堪笑世情薄，天道最公平，昧心图自利，阴谋害他人，善恶总有报，到头必分明”；从一到十的代码是“生客多察看，斟酌而后行”；“万千百两”则用“国宝流通”代替。假如票号在某年五月十日签出一张一万两的会票，其暗号密码就是：“冒平生国通”。为防止日久泄露，所采用的汉字代码还要不断更换。后来，当电报汇兑兴起后，日升昌又将总号发给分号的电报次序也编成五言诗，以避免发生电报脱漏现象。

除了票汇之外还有信汇。17世纪60年代，中国有了电报之后，日升昌票号也开展了电汇业务。

在经营汇兑的同时，日升昌还有经营存放款业务，并且把存放款与汇兑结合起来，以便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客户的需求。

日升昌票号在成立后创立的各种制度和经营方式，为后来出现的其他票号相模仿，在各地票号长时期的发展中，

票号制度和经营方式又不断得到完善。

由于雷履泰善于经营，日升昌票号发展很快，到雷履泰晚年，日升昌在全国各大商埠设立分号 17 家，既大大方便了各地商人的金融往来，助长了中国资本主义嫩芽的成长，也极大地带动了平遥当地的经济的发展。

道光二十年(1840)，平遥票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齐聚雷履泰在城内书院街新置的宅院，隆重庆贺他的七十寿诞，向他赠送了书有“拔乎其萃”四字的镏金匾额。据传说，雷履泰对同行赠其以“拔乎其萃”一语非常自得，后来打听到这一提议竟出自本号一位普通伙友之口，便在下一次评定伙友顶身股时，为他顶了二厘的身股。不管这段传说的真伪如何，作为中国票号业的创始人，对“拔乎其萃”四字，雷履泰的确受之无愧。

三、雷、毛矛盾和山西票号的发展

在日升昌旧址，嘉庆己卯科状元陈沆题写的“日升昌”老匾额早已不见踪影，但开业时的一副对联还完好地悬挂在铺院过厅的两根铭柱上。联云：

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

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

气势雄壮的“独居奇”三字，传达出创业者希望垄断汇兑一业的美好心愿。日升昌成立后，在一段时期里也确实垄断了汇兑市场，可惜，这种垄断局面仅维持了几年时间，日

升昌内部就出现了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翔之间的权力斗争。雷毛之争看似一件争权斗气的小事,但却对日升昌也对整个中国票号业的发展产生了预料不到的影响。

毛鸿翔(1787—1865),字振羽,平遥邢村(现名喜村)人。其父毛际美,长年在京津等地经商。受家庭影响,少年时即立志从商。长大后,进入平遥城内聚财源粮油店,当了一名给客户送面送油的伙计。在聚财源,毛鸿翔干过一件“买油篓巧分油”的漂亮事。一次,掌柜派他到晋北某地订购食油,但当他到达时,发现油已被全部订完。同来的伙友都大失所望,准备套车回家。但毛鸿翔却不气馁,他想到装油还得要油篓,便到油房附近的村庄,将正在编制的油篓全部预先买下,这才返回平遥。等到订油者要买油篓取油时,才发现油篓已被毛鸿翔预订一空,只好折到平遥聚财源粮油店找到毛鸿翔,以他们原订之油分给毛鸿翔一部分,才得到了油篓。由于毛鸿翔的机智,使得聚财源不仅没有耽误当年的买卖,反而多赚了钱。毛鸿翔当时经常往西裕成送粮油,表现得勤快踏实,精明能干,雷履泰便瞅机会将毛鸿翔要到西裕成,不久就派到北京分号住班锻炼。

进入西裕成后,毛鸿翔工作起来格外卖力,业绩也很突出。雷履泰酝酿改组票号前,又将毛鸿翔调回总号,大力荐举,使他年仅30余岁就当上了日升昌二掌柜。

俗话说:一山难容二虎。雷、毛二人都非常能干,开始时还能同心协力,但日子久了,难免发生矛盾。毛鸿翔年轻气盛,有主见,有才华,看不惯雷履泰把创立票号的功劳都归到自己名下,更受不了雷履泰倚老卖老,还把他当毛头小伙

子看待的作法。而雷履泰则认为，毛鸿翔能从一个粮油店小伙计当上日升昌二掌柜，主要是他提拔重用的结果。所以，从心里只把毛鸿翔视为后生晚辈，并不当二掌柜看待。特别是，雷履泰后来看出毛鸿翔不是个安心当二把手的人，用平遥话说，就是“见不得前面站人”，从此，他对票号内的大小事情就管得更紧，轻易不让毛鸿翔插手。不知不觉中，两人已从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变成面和心不和的政敌。

道光六年(1826)，日升昌第一代东家李大全去世，由他的儿子李箴视继任。不久，雷、毛两人的矛盾就爆发出来。导火线是雷履泰生病。

这年，五十六岁的雷履泰终于累倒了。但是，即使在他卧床养病的时候，大小号事也得事事向他请示汇报。时间一长，给票号的日常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，号内伙友对此也颇有微词。毛鸿翔认为争取权利的机会来了，于是向李箴视建议：在号内养病不太安静，可否请雷掌柜先回家调养，等病好后再回来理事。年仅16岁、刚刚接过东家重担的李箴视不识其中玄机，反而认为二掌柜考虑周全，便面劝雷履泰暂先回家休息，号内杂事可交待给二掌柜毛鸿翔去办。雷履泰心中不悦，但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是称：我也早有此意，承蒙东家关心，我今天就回。

不久，李箴视再去雷宅探望雷履泰时，发现桌上堆积着许多撤庄的信笺，便警问其故。雷说：字号是东家的，码头分号是我安的。把各分号撤回来，向东家作个交代，我就离号休息。李箴视大吃一惊，这才明白雷掌柜误会了让他回家养病的意思，便再三请求收回成命，雷只是不允。李箴视下跪

说，你不答应，我就长跪不起。雷履泰只好说：起来吧，让我回家谅也不是你的主意。

雷履泰虽然答应不再撤回分号，但仍借口养病不回去理事。李箴视便每日派伙计往雷宅送一桌酒席，五十两白银，以示慰问。毛鸿翔很清楚，雷履泰这样做就是要挟东家逼自己出号，而且也看出东家对雷履泰依赖太深，再呆下去，既无益也无趣，便主动辞职，离开了曾寄托过自己远大理想的日升昌。

毛鸿翔离开了日升昌，并不意味着雷、毛二人的个人恩怨就此一刀两断。相反，由于一位大财东的介入，反而变得越发不可收拾。这位财东就是蔚泰厚东家侯荫昌。

侯荫昌，介休北贾村人，以经营绸布杂货业为主，有大小字号 50 余处，其中有几个绸布庄开在平遥城内，最大的就是与日升昌仅隔一个烧饼铺的蔚泰厚绸布庄。日升昌管理层内部矛盾激化之日，正是侯荫昌想改营票号却苦于无人之时。毛鸿翔一离开日升昌，侯荫昌便将他聘到蔚泰厚，把绸布庄改组成票号，并聘任毛鸿翔为蔚泰厚票号总经理。接着又将侯氏家族控制的天成亨布庄、蔚盛长绸缎庄、新泰厚绸布庄、蔚丰厚绸缎庄，相继改组为票号。五家票号资本总和超过 70 余万两白银，均由侯氏家族独家投资或控股，他们声势相通，左右迎和，在重大决策上受势力最大的蔚泰厚统一节制，在票号界号称“蔚字五联号”，而蔚泰厚大掌柜则有五联号大总管的雅称。

为了激励毛鸿翔的积极性，侯荫昌还在蔚泰厚和新泰厚给毛鸿翔各顶了一股身股。身股，也称“顶身股”、“顶生